



## 【晚清民初期刊演化与科学传播研究】

**【主持人语】**：鸦片战争前夕的二三十年间，一个新的科学传播媒介出现在汉字文化圈，这就是清嘉庆二十年（1815）8月5日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月刊和清道光十三年（1833）创刊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月刊。这两份期刊一在境外，一在境内，开创了中文期刊的先河，并以其每月连续出版的新颖方式，大大改变了科学传播时间长，且时断时续，一时兴盛，一时沉寂的状况，持续不断地传来境外有关科学、技术、经贸、时事、宗教的消息。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江苏吴县（今苏州）唐大烈创办的《吴医汇讲》是中文期刊的萌芽，但这种源于中国传统的、连续性丛书出版的期刊雏形并未在那个时代孕育成中文期刊之林，倒是新教传教士以“上帝赐予”方式促生了中文期刊的成长壮大。从1815年至1919年，共创办中文期刊1184种。

期刊的信息传播速度比图书要快得多，与同期出版的图书小册子相比，期刊显然更具有连续出版、影响持续、传播量大的优势，这在科学传播载体形态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期刊科学传播媒介的诞生无疑打破了图书传播科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与报纸一起形成了一种持续至今的、各司其职，分工合作，互补共存的特殊传播系统——书—报—刊科学传播系统。报纸具有即时性、简短性、新闻性功能，书籍具有汇编性、集成性、阶段性功能，而期刊具有前沿性、探索性、时效性功能。同时，书报刊又各自成为三个不同的子系统，与书—报—刊大系统交换能量，三者缺一不可，并功能互补，使书—报—刊知识系统不断充实、更新、发展。期刊之所以逐渐成为科学成果传播的主角，是由期刊自身的特点和科学知识的前瞻性所决定的。期刊的出版周期介于书籍和报纸之间，既能弥补书籍出版相对滞后的缺陷，又能填充报纸深度和专业性、学术性不足的空白。加之科学的前沿性、动态性、专业性要求能够与之相匹配的媒介出现。期刊的连续性、系统性这一特点恰好与其相符。两者最为恰切的结合把科学知识的传播效果发挥到了极致。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晚清民初期刊演化与科学传播研究”项目（07XXW004），正是要历史地回放这波澜壮阔的一幕，并且从“期刊传播学”的新视角来揭示其演化与发展。

主持人：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姚远编审

# 《新青年》的经营与传播创造

姚 远

（西北大学 编辑出版与传播科学研究所 西北大学 数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基于新闻事业史和科学传播角度的原始期刊文献调研和考证方法，对《新青年》媒介形态作全面研究，为五四时期科学传播史研究提供典型案例。研究表明：《新青年》首先改用白话文和采用新式标点符号；首次实行轮值主编制度；通过赠送、交换、代派销售、登载广告等多种方式经营管理，成功地使发行量达到15000份以上；曾出版“新青年丛书”、专号或专号出单行本、合订本重印等形式，实现再传播增值或扩大传播范围。结论认为：《新青年》一扫晚清以来中文期

收稿日期：2007-07-07；修回日期：2010-09-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7XXW004）

作者简介：姚远，男，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从事科学传播史研究。

刊传播科学多由传教士把持或国人自办期刊影响很小的局面,创造了中国近代期刊作用于社会和与时代俱进的一个奇迹。它还以其期刊类型、办刊理念、编辑模式和传播策略,影响一批新型的国人自办期刊,推进了文化的转型,引领了国人自办期刊的新方向,也使期刊载体的内涵、外延及其社会功用得到空前的提升。

**关键词:**《新青年》;媒介组织形态;编辑出版传播;中国期刊史;科学传播史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0)06-0041-08

以政论为主的文理综合性青年月刊《新青年》是一份研究成果较多的期刊<sup>[1-3]</sup>,然而从编辑出版、媒介组织形态以及科学传播视角切入的研究还较为薄弱。

## 一、编辑出版概况以及与《科学》的关系

《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由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开办的群益书社印刷和发行,青年杂志社(新青年杂志社)编辑,1920年9月第8卷起改由新青年社印行。主编者陈独秀(1879—1942)。创刊号有陈独秀的《敬告青年》等。

1916年2月15日,1卷6期出版后因战事而停刊半年。1916年9月1日第2卷第1期复刊后改名为《新青年》月刊,一说改名是因为与上海基督教会主办的《上海青年》有名称的雷同,群益书社征得陈独秀的同意而改名。

1916年底,蔡元培(1868—1940)约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期刊编辑部遂自1917年1月起迁北京(位于北河沿箭杆胡同九号陈独秀家)。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积极投身于运动之中,6月,在一次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新青年》第二次被迫停刊近半年,9月,陈独秀被救出狱,11月复刊。随后,1920年初陈独秀回到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亦再次迁回上海。

1921年4月1日,自第8卷第6期迁广州出版。1921年9月再第三度迁回上海出版,并在1923年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理论刊物。1922年7月第9卷6期出版后暂时休刊。1923年6月在广州复刊后改为季刊,仍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出版至1924年12月(共出4期)再次休刊。1925年4月再次复刊,改为不定期刊出版,共出5期。1926年7月《新青年》出完不定期刊第5期后,最后停刊。前后持续11年,共出9卷63期。今存上海图书馆。人民出版社于1954年曾出版影印本。

历史上,《新青年》杂志社自己也曾出版“新青年丛书”、专号或专号出单行本、合订本重印等形

式,扩大影响。其先是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4卷5期预告即将出版的“易卜生号”;1918年6月15日按时出版4卷6期的“易卜生号”,又同时为“易卜生剧丛”单行本所作的广告:“本社拟于暑假印行‘易卜生’。第一集中含‘娜拉’、‘国民之敌’及‘社会栋梁’三剧。此外,并有胡适君之序言,解释易卜生之思想”。该期还同时为“萧伯纳专号”征稿。由此可见其出版和传播方式的多样化。1920年8卷3期载有“新青年丛书”的广告,包括:第一种,克卡普(Kirkup)著《社会主义史》;第二种,哈谛(Hart)著《疯狂之心理》;第三种,罗素(Russe)著《哲学问题》;第四种,柯尔(Coe)著《工业自治》;第五种,罗素著《到自由之路》等。1919年5月出版的6卷5期即载有《新青年》1卷至5卷再版预约的广告:“本志出版,前后五年,已经印行三十三号,提倡新文学,鼓吹新思想,通前到后,一丝不懈,可算近来极有精彩的杂志。识见高超的人,都承认本志有改造思想的能力,是中国最有价值的出版物。于是,买的一天一天多起来,从前各号大半卖缺,要求再版的,或亲来、或通信,每天总有几起,因此敝社发行前五卷再版的预约券”。这种做法无疑又是一次很好的再传播和再增值方式。

《新青年》与《科学》杂志有着密切的关系。《新青年》创刊伊始就在1915年1卷第2期起开始在封二等显著位置为《科学》杂志做目录广告,一直持续到五四运动结束。首次广告词主要介绍了《科学》的办刊宗旨和特色:“《科学》——有志研究科学者,有志讲求实业者,有志储学救国者,均不可不读”;“《科学》乃中国科学界惟一之月刊,为留美中国学界热心研究科学者所刊行,宗旨纯正,眼光远大,特色甚多,略举其要:(一)材料新颖,包罗宏富,每阅一篇,兴味洋溢;(二)宗旨抱定,输入科学,政治空谈,概不阑入;(三)撰述自出,机杼译笔,力求雅洁,审定名词,惟主一是;(四)印刷鲜明,图画精细,令阅者自生美术之观感;(五)按月出版,绝不愆期”。今已出至第一卷第九期”。之后,几乎每期都有《科学》的目录广告。

《新青年》和《科学》的作者群,无论在哲学与社会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层面,都有一定的交叉。像任鸿隽(1886—1961)就是这样的人物。任鸿隽曾有日本高等工业学校、康奈尔大学文学、化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北京大学化学教授等学历和经历。1914年在美国发起中国科学社,次年成立并创刊《科学》杂志,曾任中国科学社董事会会长和社长。曾在《科学》发表了《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化学元素命名法》《科学家人数与一国文化之关系》《科学与教育》《科学历史之时代》等大量论文。1918年10月回国。刚刚由美国回到上海的任鸿隽被报纸报道“科学家回沪”,颇感“不敢当”,为此特别写了《何为科学家?》一文,并特别记述了《新青年》杂志记者向他约稿一事。该文前言中有“这篇文字是我才由美国回来的时候,在上海寰球学生会的演说,当时曾经上海各日报记载,但是记得不完备,我久想把它另写出来,后来《新青年》记者来要文章,一时无以应命,因趁此机会,把这个题目写出来,同大家商量”<sup>[4]</sup>。之后,此文发表于《新青年》1919年6卷3期。

人文方面的胡适,据说其姓名亦取自严复(1854—1921)所译《天演论》中“适者生存”之意。他1910年到康奈尔大学后本在农学院习农,1912年转入文学院习文,有一些科学技术背景,既是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发表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论短篇小说》《贞操问题》《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不朽》《实验主义》《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等大量论文及文学作品。1915年夏,他为《科学》杂志作《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万字长篇论文,后发表于《科学》1916年2卷1期;1916年应任鸿隽之约,为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年会撰写论文《先秦诸子之进化论》,由杨杏佛(铨,1893—1933)代在年会宣读,后载于《科学》1917年3卷1期。当《科学》刚从美国迁回国内时,稿件缺乏,任鸿隽还致信胡适约稿和为年会代为征求论文。信中提到:“今年年会论文,尚无一篇,兄在大学,于哲学上必有新研究,能许我一篇否?大学同志中必多学者,请代年会征求论文”<sup>[5]</sup>。1920年前后,胡适甚至还担任过《科学》的编辑员。《新青年》自然科学方面的主要撰稿人王星拱(1887—1949),后来也曾担任《科学》在成都的通讯员。

由此,《新青年》虽为文理综合性期刊,但毕竟只能侧重于科学规律、科学家、科学社会功能、科学

思想、科学方法的层面,而《科学》杂志虽然也有些人文科学的内容,但毕竟为综合性科学技术期刊。然而,却经由这一文一理两种期刊不经意的结合,使二者的宗旨和主张更为鲜明和充实,也形成了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更为深厚和鲜明的底蕴和内涵。

《新青年》也曾为五四时期的另一份偏重科学的杂志做目录广告,那就是《学艺杂志》。见有8卷5期以补白方式载有丙辰学社编辑、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1920年11月30日出版的2卷8期《学艺杂志》目录广告。其主要科学论文有李贻燕的《中国地图学史》,杜亚泉(1873—1933)的《有机化学命名之讨论》(其二)和《中国医药的研究方法》,张资平的《结晶符号与几何方程之关系》和《约檀河之水》,林骅的《运材人力之科学的管理》等。有趣的是该期《学艺》作者中作为《东方杂志》主编的杜亚泉曾经和《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刚刚进行过历时三载的关于保守与激进的辩论。

## 二、主编、撰稿人与办刊宗旨

主编者陈独秀既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学者,亦为报刊活动家。原名乾生,字中甫,别署实庵,笔名独秀、双眼等。清光绪五年(1879)生于安徽怀宁。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中秀才。光绪二十六年(1900)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光绪二十八年(1902)回国。他一生先后主编或参与创办10余种报刊,为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编辑安徽《白话报》;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协助章士钊编辑《国民日报》;清光绪三十年(1904)秋,在家乡芜湖创办并主编《安徽俗话报》;1913年流亡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从事反袁活动,1915年夏回国;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兼《中华新报》笔政;1917年8月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次年底与李大钊合编《每周评论》。之后,还曾参与创办《共产党》月刊、《劳动界》《伙友》《向导》周刊等。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后,于1930年主编《无产者》、1931年创办《火花》《热潮》等。1942年5月病逝于四川江津。

《新青年》创刊之初的1915年至1917年3卷5期,陈独秀在杂志上发表政论、杂谈、书信等文章60余篇,主要有《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今日之教育方针》《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吾人最后之觉悟》《我之爱国主义》《孔子之道与现代

生活》《文学革命论》等代表作。从 1917 年至 1920 年,办刊宗旨由“思想启蒙”转向以“国命存亡”为主而兼及思想启蒙,陈独秀发表有 50 余篇政论、随感、诗作等文章,思想启蒙主要有《近代西洋教育》《科学与基督教》《人生真义》《有鬼论质疑》《偶像破坏论》《基督教与中国人》等,国命存亡方面主要有《复辟与尊孔》《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实行民主的基础》《法律与言论自由》《过激派与世界和平》《谈政治》等。

最初的主要撰稿人大多为陈独秀的安徽同乡,诸如高一涵(1885—1968)、刘淑雅(1890—1958)、易白沙(1886—1921)、谢无量(1884—1964)、潘赞化(1885—1959)、高语罕(1888—1948),以及汪叔潜、彭德尊、李亦民、孟明、汝非、薛琪瑛、萧汝霖、谢鸣、方澍、李穆等。由此可见,初期的作者队伍还比较单一,几乎成为志趣相投者的老乡刊物。这与“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然不自拘限,社外撰述,尤极欢迎,海内鸿硕,倘有佳作见惠,无任祈祷”<sup>[6]</sup>的自白多少有些出入。

1916 年 9 月改刊名为《新青年》后,安徽籍作者有所减少。1917 年陈独秀受聘北京大学,《新青年》亦北迁北京,作者队伍遂彻底突破安徽圈,鲁迅(1881—1936)、李大钊(1889—1927)、胡适(1891—1962)、钱玄同(1887—1939)、刘半农(1891—1934)、傅斯年(1896—1950)、罗家伦(1897—1969)、沈伊默(1883—1971)、毛泽东(1893—1976)、恽代英(1895—1931)、周作人(1885—1967),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几乎所有精英,都成为《新青年》的撰稿者。1916 年 10 月 1 日出版的 2 卷 1 期和 1917 年 3 月 1 日出版的 3 卷 1 期封二均载有《通告》:“本志自出版以来……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1876—1946)、吴敬恒(稚晖,1865—1953)、张继(1882—1947)、马君武(1881—1940)、胡适、苏曼殊(1884—1918)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由本志发表”。这说明,改为《新青年》后还特约了一批名流作者。

1918 年 1 月《新青年》成立编委会,改变了以前由陈独秀一人主要编辑的局面,思想启蒙的意味也更加浓厚。之后,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伊默、高一涵等轮流编辑撰稿(相当于轮值主编),每人一期,周而复始。编委会的民主集议制度在期刊史上亦具有重要意义。

1920 年初再迁上海后,陈望道(1891—1977)、李达(1890—1966)、李汉俊(1890—1927)参加编辑

工作。同年 8 月起,由陈望道负责编辑工作。1923 年在广州复刊时由瞿秋白(1899—1935)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创刊之初,鉴于当时的时局,编者提出:“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修身治国”;“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年志趣者,竭力阐述。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冀青年诸君子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sup>[6]</sup>。“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sup>[7]</sup>。这一时期的宗旨显然以思想启蒙为主,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sup>[8]</sup>,而对于诸如筹安会讨论国体这样的政治问题则取“雅非所愿”的态度。其宗旨和追求的基调:一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即“各有自主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出之义务”;二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即“不进则退”,“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万无保守现状之理”;三是“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即“当此恶流奔进之时”,“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四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即知“牵一发而动全身”,“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故应“善变”、“竞进”,绝不可“锁国闭关”;五是“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即“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使“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六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要“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实证”,切忌“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sup>[6]</sup>。其宗旨的关键词就是“民主”、“科学”、“进取”和“开放”。

自从 1916 年 2 卷 1 期起由《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后,这种主旨略有变化,即比起过去对青年的笼统要求来,对其人生观、幸福观、体育观、国家意识、时代意识有了更为具体而明晰的要求。陈独秀的《新青年》和李大钊的《青春》为其确定基调。陈独秀在谈及新旧青年区别时指出:“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而新旧之别安在。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实际上就是要将“美其貌,弱其质”、“力不能堪”、“只知升官发财”和“悉秉蒲柳之资,绝无桓武之态”的旧青年“自绝望消沉中唤醒”,做“二十世纪之新青年”<sup>[9]</sup>。李大钊也从人之有青春、暮年和死亡,地球和宇宙也有青

春、白首和衰亡谈起，号召吾“前途辽远之青年”、“任重道远之青年”，以“高尚之理想、神圣之使命、远大之事业、艰巨之责任”，成就“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sup>[10]</sup>。

从1917年3卷5期至1920年8卷1期，《新青年》虽然尚有少量思想启蒙的讨论，但办刊宗旨已经逐渐转向“国命存亡”的具体时政研究与讨论。董根明以此时间截然划分为“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两个阶段，稍有不妥<sup>[11]</sup>。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再次慷慨重申了《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的宗旨：“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只因为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最后，更是慷慨兼义愤道：“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sup>[8]</sup>。

根据办刊宗旨，不同时期的栏目设置有所不同。其月刊时期（1915—1922）的栏目主要有论述、国外大事记、国内记事、通信、世界说苑、读者论坛、插画等。其出现过的内容大致可分为政治·思想、法律、历史、社会问题、语言文字、文学（诗、戏剧、小说）、传记、记事、文艺、读书笔记、读者论坛、通信、随感录、会议报道、附录。另外，还出版过人口问题、劳动节、工读互助团问题、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讨论、罗素著作介绍和评论、俄罗斯研究等专栏或专号。有关科学的内容常见于政治思想、传记、其他等栏目。其论述、国外大事记、国内记事、通信等主栏目维持时间较长，余则随时变动或新增，并表现出较强的策划意识。陶虹、刘娟对《新青年》的栏目策划等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sup>[12-13]</sup>。

《新青年》的“通信”栏目，主要刊载编者、读者、作者三者的来往信件，是其最生动、最丰富的内容之

一，甚至从其议题中产生了新的论题，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作者和读者参与。其“社告”指出：“本志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可启发心思，增益神志”<sup>[6]</sup>。

### 三、期刊的经营

《青年杂志》出版后，“销路甚少，连赠送交换在内，期印一千份”，到1917年，“销数渐增，最高额达一万五六千份”<sup>[14]</sup>。张国焘回忆，《新青年》“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sup>[15]</sup>。

稿费以1915年9月15日出版的创刊号月刊为准，一经刊用皆奉上海通用银元现金，每千字自2元至5元。

定价以1915年9月15日出版的创刊号月刊为准：每册2角，半年6册1元，全年12册2元；邮费本国每册3分，日本每册3分，其他每册1角。

发行的方式：一是在上海群益书社设立总发行所，在全国各地及新加坡等地设立代派处经销；二是通信购书（实为邮购），全部7折。在北京、天津、保定、济南、烟台、太原、西安、昆明、贵阳、成都、重庆、泸州、梁山、开封、广州、桂林、奉天、哈尔滨、长沙、汉口、武昌、南昌、安庆、芜湖、蕲溪、福州、厦门、苏州、南京、无锡、扬州、杭州、常州、宁波、绍兴、温州，以及新加坡等地设有代清机构。由代派处的分布，可大致了解其传播范围。

在广告经营方面，初期多为群益书社的书目广告，后期扩展至期刊和其他书局的书目广告和期刊目录广告。与《新青年》相关的《科学》《每周评论》《改造》《学艺》《北京大学之新潮》等。其中，甚至将《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做捆绑式宣传。1918年5卷6期的《每周评论》广告即有：“看《新青年》的不可不看《每周评论》”的广告词，表明二者一个为月刊，一个为周刊；一个为长篇文章，一个为短篇文章；一个“重在阐明学理”，一个“重在批评事实”；各有特色，互不重复。这些宣传，与《科学》等其他五四期刊形成一种组合效应，进一步扩大了《新青年》的影响。

教科书广告涉及科学内容者，包括：（1）创刊号所载的数学教科书广告，主要为上海群益书社“根据日本近年最通行之教本”，译编的中学用数学教科书，有《算术之部》《代数之部》《几何之部》《三角之部》，赵繅译《微分积分学纲要》，黄璜编《实用微

分积分学》,彭延致译《解析几何学纲要》,仇壮瀛译《新撰解析几何教科书》,仇毅译著《查里斯密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平面三角法教科书》《几何学教科书》《查里斯密初等代数学》,李国钦,登彬译的《平面三角法》,谷钟琦译《平面几何讲义》,孔宪先编《算术难问三百解》;张毅著《陈棍算术问题正解》等。(2)第2期所载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的理化教科书广告,有陈家灿编译的《最新化学教科书》,丛瑄珠编译、以日本田中、本多两博士在日本各学校的主讲教材为蓝本的《新撰物理学教科书》,石声灏、黄邦柱所编的《化学教科书》,蔡钟瀛编译的《物理学教科书》,黄邦柱编译、以日本龟高德平所著为蓝本的《化学讲义实验书》,谢祐生所译的《定性分析化学》,史浩然所译的《物理学讲义》和《化学讲义》,谢怀震所编的《详明图解动物学》,李犹龙所编、以日本医学士菊池林原著为蓝本的《传染病预防法看护法》《中华民国地理新图》等。(3)1915年2卷1期,鉴于“男女之职事不同,其应用科学亦生差异”,《新青年》的出版者群益书社“辑译女子教科书全编,其内容材料皆以切近女子事情为主”,还刊出一套师范、中学女子科学教科书广告。其内容包括《女子算术教科书》《女子代数教科书》《女子几何教科书》《女子化学教科书》《女子物理教科书》《女子生理教科书》《女子矿物教科书》《女子动物教科书》《女子植物教科书》《女子家事教科书》《女子簿记教科书》《女子缝纫教科书》等。

其中,绝大部分编译教材,取自日本。比如,赵縠,易应岷所译的中学用7部《数学教科书》“皆日本近年最通行之教本”,其教科书或重解题、或重看护实践、或重实验的教学特点,且不致取法简陋或因所用器械简单而使必备试验废弛,于我国当时学校尤为便利。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译自欧美的教科书或工具书也逐渐多起来。如创刊号中的书籍广告《中英会话辞典》即译自美国伯言博士(F. W. Estlake),创刊号广告中的青年文学丛书也全部译自欧美。这些数、理、化、生、地、医学等科学教科书广告,不仅可增期刊收入,了解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前夕我国科学教育及理科教科书效仿日本的状况,也在某种程度上烘托了《新青年》杂志刻意追求的民主与科学气氛。

#### 四、编辑传播创造

其一是率先采用新式标点符号与白话文。

《新青年》首创改用白话文和采用新式标点符

号。1916年2卷2期所载《胡适致陈独秀》的通信中首先提出著名的“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之结构,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语,须言之有物”等“八事”。陈独秀还就此向远在美国的胡适约稿,并迅速将其《文学改良刍议》的特约稿发表于1917年2卷5期。陈独秀也发表《文学革命》呼应之。之后,又专门开设语言文字专栏,先后发表有钱玄同的《句读符号》《中文改用横行的讨论》《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减省汉字笔画底提议》,吴敬恒的《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朱希祖的《白话文的价值》,胡适的《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陈望道的《横行与标点》,俞伯平的《白话诗的三大条件》等文章,作了很多有意义的讨论。

在《新青年》的前3卷,圈点停顿、圈点断句、用顿号代替逗号或着重号等标点方式混用,并无明确章法。从1918年4卷1期起,《新青年》开始使用新式标点符号。标点符号铜模出自群益书社的陈子寿和太平洋印刷厂的张秉文,系以外文标点符号作为样板铸就。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还发表《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作了进一步宣传。

在《新青年》创刊的第三年,白话文即被提上议事日程。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一文中肯定“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sup>[16]</sup>。钱玄同在1917年8月写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也指出:“《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做宗旨,则自己便须实行除旧布新”<sup>[17]</sup>,并认为“我们正好借这《新青年》杂志来做白话文章的实验场”<sup>[18]</sup>。《新青年》自第2卷第6期起,胡适在《新青年》发表8首白话诗作,沈伊默、刘半农、鲁迅等步其后,先后发表160余首白话诗,数部白话小说、13部白话剧作等,从而奠定了期刊白话文体的多样化基础。1918年4卷5期所发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

这是继《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绍兴白话报》《安徽俗话报》《北直农话报》之后,我国期刊白话文体的一次飞跃,并使其最终演化为一场大规模的革新运动。1920年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的跟进,使期刊文言文越来越没有公开的发表场合。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认定小学和中学的教科书可以使用白话文,并将其作为国语。

其二是在补白中使用诗词、格言、谚语,升华编辑传播思想。

《青年杂志》创刊初期,对补白的处理有独到之

处,它不像当时有些杂志多以广告补白或直接留空,而是几乎全部补白。其内容多为与杂志办刊宗旨紧密相连的诗词、格言或谚语。比如:创刊号第15页《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一文的1/2补白为署名夏正夫的语录“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学可惜,此日闲过可惜,此身一败可惜”,既与大生物学家赫胥黎一生的治学相符,又与《新青年》号召青年修身治国的宗旨相符。创刊号《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文末、《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文末和《现代文明史》文末补有葡萄牙谚语“能为之时而不为之,欲为之时而不能矣”、丹麦谚语“谋事宜于老者,行事宜于壮年”和英国谚语“老来无学之苦,远甚于少时力学”,用欧洲人的谚语补述前文“欧洲与近世文明”中的未尽含义,却又说给中国青年读者听,也补得恰到好处。创刊号《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一文第8页文末的1/2空,补为陆游的《夜泊水村》,诗曰:“腰间羽箭久凋零,太息燕然为勒铭;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记取江湖船泊处,卧闻新雁落寒汀”,既将中国青年以万死报国的冲天志向补得有了新的豪气,又使读者在空白处多了一些让人感同身受的恰当停歇。在《女性与科学》一文末的整页补白为西乡隆盛据文天祥诗改写的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也与全刊所倡导的精神呵成一气,只是整页只有32个头号字,显得有些过于空荡;1卷5期《大力士霍元甲传》文末补白为殷曼生的语录“世界历史所载种种伟大而能动人事业,无不为一种愤心之成功”,也颇能反映霍元甲成功的动力。1卷5期《述精武体育会事》文末以赅兴“集乌合之众而尽心久练之,则终成劲旅”,则简直就是对该文的一个提炼和升华式的总结。

自第2卷后,这种补白逐渐以书籍广告取代,像2卷3期《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文末甚至任其2/3的空白存在,特色遂不再。

## 五、结 论

在中国近代史上从来没有一份期刊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以致于在90余年后仍然有不少人致力于发掘其现代价值。它是五四运动中枢机关的代言人和喉舌,是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扩音器。通过这一物质载体,科学与民主这两面大旗高高飘扬在封建势力犹在、共和概念初识的中华大地。它开创了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给中国人的思想以深刻启迪,

先是以“思想启蒙”式的润物细无声,滋养中华大地,继而以“救亡图存”式的暴风骤雨,惊醒东方睡狮,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它与《科学》两份杂志,一份代表人文思想,一份代表自然科学,是五四运动大河的两大主要支流。二者各具特色,侧重点各异,却又各扬所长,互补短长,一文一理,交相呼应,相互渗透,从而形成了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交相辉映的多层蕴涵。由于《新青年》更注重于与民主思想、人的基本需求、个性的解放的密切联系,因而更具有思想启蒙的意味,故成为五四科学潮流中最波澜壮阔的主河道。它一扫晚清以来中文期刊传播科学多由传教士把持,或即便有《时务报》《农学报》《算学报》和《亚泉杂志》等国人自办期刊的尝试却影响有限的局面,创造了中国近代期刊作用于社会和与时代俱进的一个奇迹。用“振聋发聩”、“石破天惊”、“岩浆喷涌”这些词汇形容其声势浩大的创造,确不为过。重要的是,它还以其期刊类型、办刊理念、编辑模式和传播策略,影响了一批新型的国人自办期刊,与《每周评论》《新潮》《国民公报》《湘江评论》《浙江新潮》等期刊呼应,共同推进了文化的转型。它也影响和改造了像《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学生杂志》《教育杂志》等旧有期刊,引领了国人自办期刊的新方向,也使“期刊”载体的内涵、外延及其社会功用得到空前的提升。其主编轮值、编辑集议、编辑学者化、编辑引导社会思潮、编辑传播策略、期刊经营方式,甚或期刊罪案、主编被捕、被害、历经停刊复刊等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是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遗产。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8: 1-40
- [2] 丁守和. 陈独秀和《新青年》[M]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8
- [3] 姚远. 《新青年》及其科学观念传播 [J]. 商洛学院学报, 2010, 24(3): 6-12
- [4] 任鸿隽. 何为科学家? [J]. 新青年, 1919, 6(3): 247-253
- [5] 任鸿隽. 致胡适. 胡适来往书信选. 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40
- [6] 编者. 社告 [J]. 青年杂志, 1915, 1(1): 1
- [7] 陈独秀. 通信. 1915, 1(1): 1
- [8] 陈独秀.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J]. 青年杂志, 1915, 1(1):

- [9] 陈独秀. 新青年 [J]. 新青年, 1916, 2(1): 1-4
- [10] 李大钊. 青春 [J]. 新青年, 1916, 2(1): 1-12
- [11] 董根明. 《新青年》主旨变化探略 [J]. 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 1997, 16(4): 11-14
- [12] 陶虹. 陈独秀卓越的《新青年》编辑群组与期刊策划 [J]. 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2007, 17(6): 85-91
- [13] 刘娟. 《新青年》编辑思想的启示 [J]. 编辑学刊, 1998 (5): 73-76
- [14] 戈公振. 民国初期的重要报刊 [M]//张静庐.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315-316(注 6).
- [15] 张国焘. 我的回忆. 第 1 册 [M].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1.
- [16] 陈独秀. 文学革命论 [J]. 新青年, 1917, 2(6).
- [17] 汪原放. 回忆亚东图书馆 [M].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3
- [18] 陈独秀. 独秀文存 [M]. 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2

[责任编辑 赵 琴]

## The management and dissemination creation of the *New Youth*

YAO Yu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stitute of Edit-Publ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primitive periodical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hat based on the journalism history and the science dissemination angle, do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New Youth*'s media forms to provide the illustrative case for science dissemination history research that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e *New Youth* first changes to the vernacular literature and uses the new style punctuation marks; first implements the system that chief editor takes turns on duty; through many kinds of management like the present, the exchange, the sent sales sell, publish the advertisement and so on, enables the quantity issued to achieve above 15,000 successfully; once published the *New Youth collection*, the special number or the special number publishes the pamphlet, the one-volume edition to reprint and so on, realizes disseminates again rises in value or expands dissemination scope. The conclusion thought that the *New Youth* has swept the situation that Chinese periodical dissemination science mainly dominated by the missionaries or the influence of periodical manag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themselves is very small since latter Qing dynasty, which has created a miracle of Chinese modern times periodical function in social and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Its periodical type, the idea of managing publication, the editing pattern and the dissemination strategy also affect a new group Chinese people to manage periodical themselves, advance cultural reforming, lead the new direction of the periodical manag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themselves, and make unprecedented promotion of the connotation, the extension and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eriodical carrier.

**Key words** the *New Youth*; Medium organization shape; Dissemination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Chinese periodical history; Science dissemination history